

俄羅斯的黃禍觀念

劉 蕭 翔^{*}

摘 要

俄羅斯自十九世紀中葉積極經略遠東後，與中日兩國在東亞的衝突便不斷升高，集體歷史記憶——黃禍因而再現於俄國，且隨著世局變遷與內部政權嬗遞而有不同的詮釋。本文自古至今地梳理俄羅斯的黃禍觀念，透過歷史脈絡的連結分析，探究不同時期俄人所認知的黃禍恐懼，從而理解該觀念的本質為何。

關鍵詞：黃禍、西化派、斯拉夫派、俄羅斯、非法移民

^{*}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Russia's Yellow Peril

Liou Shiau-shyang

Abstract

After Russia's rapid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 the Far East since the mid-1800s, the tension among Russia, China and Japan in East Asia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thus the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Yellow Peril was reemerged in Russia, and was reinterpreted with the change of external world situation and its internal regime. This thesis intends to analyze Russia's Yellow Peril since ancient time, and explore Russia's perceptions toward Yellow Peril in different period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such ideas involved.

Keywords: Yellow Peril, Westernizers, Slavophiles, Russia, Illegal Immigrants

俄羅斯的黃禍觀念*

劉 蕭 翔

黃禍（Yellow Peril）作為一種無形觀念，潛藏於後實即東西文明的對立，此未因世局分合而消弭，反倒續存並伺機而動。

海因茨·哥爾維策爾（Heinz Gollwitzer，1917-1999）曾謂俄羅斯在歐洲列強裡同黃種人世界有著最古老與最密切的關聯。¹俄人自1579年越過烏拉山，1644年抵達黑龍江和太平洋濱後，與亞洲的糾葛便越來越深，與中國的關係又特為尤甚。然而，近代黃禍指涉的範圍甚廣，且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再者，儘管俄中關係糾葛已久，但俄人的黃禍一詞亦未限指中國。為此，本文擬藉由歷史脈絡的連結梳理，探究不同時期俄人認知的黃禍恐懼，從而解讀俄羅斯黃禍觀念的本質。

* 本文曾獲政大出版社「100年度思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獎——國際關係學門首獎」與「國科會98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NSC 98-2420-H-004-023-DR）補助。

¹ 海因茨·哥爾維策爾：《黃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101。哥爾維策爾所言的黃種人世界係指中國人、日本人及所有蒙古族國家的種族。

一、黃禍觀念的緣起

(一) 黃禍論的起源

哥爾維策爾認為黃禍係源於畏懼外來擴張想像的陳舊口號，使人們防範尚於準備階段的敵人；與其說是黃種人侵犯白種人，不如說是「白禍」製造了「黃禍」。歐洲人將野蠻入侵者或叛亂者稱為「匈奴」，並非二十世紀的宣傳所致，今日的黃禍威脅感受實源於歷史記憶。²

羅福惠則以為，黃禍起於西方文化對自我遭逢厄運的憂患意識預言。預言、歷史記憶和現實感受的結合，在消極面會使災禍陰影揮之不去，在積極面則可能轉化為進取動力。

在消極面，黃禍實為外部災禍預言，其於十九世紀後期由歷史記憶發展為思想學說，除因西方好辯傳統外，亦得益於西方對話語霸權的主導。歷代王朝治下的中國和孤懸海外的日本，與歐亞兩洲的古代衝突實則無關，但近代西方論及黃禍，無不以匈奴西竄與蒙古西征為口實，將匈奴人和蒙古人放大為亞洲人或蒙古人種，再具體縮小為中國人、日本人，甚至於印度人，並一律沿用黃禍煽動。

在積極面，西方自賦對外擴張、開化野蠻人的進取使命，但在東亞卻遇上前所未見的阻礙。日本西化後漸擺脫西方箝制，中國自強運動雖然竭蹶，卻已讓西方感受潛在或現實的威脅。與此同時，歐洲內部實又紛擾不堪。在東亞覺醒與歐洲衰落憂慮的對映下，黃禍當然揮之不去。歷史「亡靈」因而在轉變的時代環境裡多次「復活」。³

1271年至1368年的元朝是被中國史家正式承認的朝代，蒙古首次西征與1243年建立的金帳汗國（Golden Horde）皆早於元朝，而之後建立的汗國與元朝亦為不同的政治實體，故蒙古人後續入侵歐洲自

²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18-19、34。

³ 羅福惠：《黃禍論》（臺北：立緒文化，2007年），頁26-34、148-149。

與中國無關。羅福惠巧妙地以「歷代王朝治下的中國人」和蒙古西征區隔，而將中國人與蒙古西征脫鉤之說固然合理，但在西方眼裡卻又不然。蓋因地理大發現前，歐洲人對世界的認知仍是渾沌未明，何況在中西往來頻繁、日本崛起，乃至於近年中國威脅論再起前，黃禍毋寧說是當年匈奴王阿提拉（Attila，？-453）肆虐歐洲，與成吉思汗（Genghis Khan，1162-1227）橫掃歐亞大陸所帶給歐洲的夢魘。因此，西方將亞洲蠻族入侵的歷史記憶無限擴大亦不足為奇。

由此觀之，匈奴西竄與蒙古西征帶給歐洲的創痛迄今仍在，而此一集體記憶隨著歷史嬗變更逐步蛻變為日後的黃禍觀念。

（二）近代的指涉

源於集體歷史記憶的黃禍，近代又因各方所需而有不同的詮釋。依哥爾維策爾之見，近代黃禍初指中國海外移民運動。拉斐爾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於1819年即指出海外華人可能建立「第二個中國」，此在東南亞即體現於經濟實力雄厚的華僑。此後中國移民又向世界各地發展，繼之則是各國的排擠。⁴哥爾維策爾所言實已反映東西文明的分歧，原因在於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概念未必適用於亞洲，而中國與印度的民族遷徙更不代表建國。中國海外移民運動亦非國家主導，與西方帝國主義（Imperialism）海權擴張大相逕庭，但卻被西方主觀詮釋為黃禍根源。

1880年代，黃禍的指涉由人口溢散至經濟領域。阿拉爾（Alphonse Allard，1831-1900）即指出實施金本位的歐洲面對銀本位的黃種人時將淪為輸家，而此正是令人驚慌的「黃禍」。克勞賽（Alexis Krausse，1859-1904）也直指從商業考量才有「黃禍」，但鑑於中國復興無望，故尚不至於危害西方經濟。⁵

⁴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20-25。

⁵ 羅福惠：《黃禍論》，頁115-116；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65。

黃禍意涵擴及軍事領域亦可溯及1880年代。哥比諾（Joseph A. Gobineau, 1816-1882）即認為俄人在遠東的擴張，只會使東亞新生代在亞洲古老種族和民族的搖籃茁壯並大舉入侵歐洲；之後他又以詩歌描寫黃種人在俄國麾下進攻歐洲的遠景。拉布若（Vacher de Lapouge, 1854-1936）雖反對誇大東亞經濟力量的挑戰，也不相信策源於東亞的軍事入侵，卻引日耳曼人倒戈使羅馬帝國（Roman Empire）衰亡為例，借古鑑今推論沙皇將動員編入其麾下的上百萬中國士兵毀滅西方。⁶動員黃種人侵略歐洲之說也出現於德國，並認為俄國征服中國後可能發動中國人對抗歐洲，而驅動力便是俄國內蘊的亞洲主義（Asianism）。⁷法雷（Henri Nicolas Frey, 1847-1932）則估計中國軍隊必然現代化，而白種人必須提防。⁸各樣說法雖貌似有理，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幾近淪為次殖民地，但其間接或直接的軍事威脅性卻從未被忽略。

黃禍一詞創於何時？哥爾維策爾認為由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於1895年所創之說並不可信，毋寧說黃禍是威廉二世所間接創造和策動，而普遍流傳則能確定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⁹日本擊潰中國成為東亞霸權後也被視為黃禍，其聲勢甚至凌駕中國。

黃禍的指涉不到百年內，便由人口擴及經濟與軍事領域，但視中國和日本為黃禍之說在十九世紀中葉前卻非主流，頂多在歐洲反俄論戰時才提及沙皇可能利用亞洲民族征服統治歐洲。其因在於當時的文人和記者常將「俄國」、「韃靼」與「亞洲」混為一談，並研究俄國帝國主義的亞洲成分與可能自遠東攫取的力量。¹⁰

因此，橫跨歐亞的俄羅斯也被捲入東西文明間的對立，俄國之於歐

⁶ 羅福惠：《黃禍論》，頁123-124。

⁷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190。

⁸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137。

⁹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44-46。

¹⁰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35-36。

洲，亦如中國與日本。在中國被帝國主義叩關前，俄國似乎在更多時候擔綱黃禍的角色。此外，縱然中國積弱不振，歐洲仍有俄國動員中國人入侵的空想。顯見黃禍此一觀念因時因地而異，端賴詮釋者而定。

二、俄羅斯的黃禍觀念

處於歐亞文明交界的俄羅斯，內部就自身定位與如何看待東方亦爭論不休，連帶也影響其對黃禍的認知。

（一）帝俄時期的醞釀

俄國對東方的認識部分受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影響，部分得自與其往來的蒙古部落，以及自己派遣至中國的使節團、商隊所獲悉的情報。這些間接、不完全的認識主導俄國的東方認知甚深。在蒙古人興起前，俄人最早接觸的黃種人應是西伯利亞（Siberia）鮮卑人後裔，¹¹之後又透過蒙古人得知中國人，¹²及至日本崛起，帝俄國祚亦

¹¹ 此說係依據何秋濤之《朔方備乘》，其認為西伯利亞之名係鮮卑轉音而來。關於西伯利亞名稱源起之說主要有三，除前述的何秋濤外，尚有包爾漢、馮家升以及俄方的說法。包爾漢、馮家升兩人與何秋濤同樣認為西伯利亞為鮮卑二字的轉音；俄方說詞則是昔日托博爾斯克附近有一西伯利亞部府，為韃靼人庫程汗之居城，後為哥薩克人葉瑪克（Yermak Timofevitch，1532 / 1534 / 1542-1585）攻下後，再併額爾濟斯、托博爾及塔甫達等流域，統以西伯利亞稱之。若依俄方說法，俄人最早接觸之黃種人則為蒙古人。參見明驥：《中俄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上冊，頁20-21、68-69。

¹² 此說係根據蘇聯科學院遠東所創所所長斯拉德科夫斯基（Mikhail Sladkovskii，1906-1985）的見解，其曾提及：「俄羅斯人和中國人的初次結識，尚屬蒙古時期。那時，蒙古人常把一些俄羅斯俘虜運送到中國。中國元代正史證實，蒙古人把俄羅斯俘虜運到中國充任守護北京的禁衛軍。據推測，俄國俘虜服役的消息傳到了俄國，因為十四世紀俄羅斯編年史提過這樣的事。到過蒙古汗大本營的羅斯各王公與官員，同樣也有可能得知一些有關中國的消息，接觸到在蒙古人那裡供職的中國人。……元史亦有記載蒙哥汗（Möngke Khan，1209-1259）曾下令在俄羅斯進行一次人口調查，大概也有一些漢人官吏參與了這次調查，因為蒙古人在1269年前沒有自己的

近日薄西山。

十八世紀的西化使俄國深受西歐影響，歐亞、東西二分對立以及啟蒙運動思想家的東方觀，便構成俄國菁英的世界觀，又因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教士的推崇，中國當時更曾被視為開明專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的典範。但隨著開明專制沒落，東方亦轉變為僵化象徵，俄國自也連帶受到影響。¹³

及至十九世紀，有關俄國自身特殊道路為何及其非歐洲屬性的討論開始醞釀。知名俄國史家克流切夫斯基（Vasilii Klyuchevskii，1841-1911）即指出主導俄國發展的力量有二：一為教會引進，導向「宗教—道德」目的的希臘拜占廷（Byzantium）影響，另一則是國家引進，為滿足物質需求的西方影響。希臘影響雖未遍及所有人，卻將社會由上而下納入；西方影響雖滲入生活，卻未遍及社會。兩股平行潮流時隱時現，遂形成斯拉夫派（Slavophiles）與西化派（Westernizers）。¹⁴ 其間，中國形象逐漸發生作用，如恰達耶夫（Pyotr Chaadaev，1794-1856）正是運用中國文明已然僵化之盛行負面形象的第一人，¹⁵ 其《哲學書簡》（*Philosophical Letters*）更激盪前述兩派的發展，引發知識分子對國家歷史與未來角色的激辯。¹⁶ 為此，以下

文字，他們或者使用畏兀兒文字，或者使用漢字。」詳見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宿豐林譯，徐昌翰審校：《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41-42。

¹³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3), 3-10, 13-14. 俄國在十八世紀主要透過法國啟蒙主義者的地緣政治框架看待中國，因為當時俄國教育即以這些人的著作為教材。歐洲思想裡東西方的對立則可溯及古希臘，希臘與波斯的對立不僅被希臘人視為歐洲與亞洲的對立，也被視為自由和專制的對立。十八世紀後半期起，法語更成為俄國受教育階層的語言，俄國思想界受法國思想家影響尤深。是故，啟蒙主義對東方的看法也被俄國全盤接收。

¹⁴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克流切夫斯基)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часть III* (俄國史教程—第三卷)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 243-245.

¹⁵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16.

¹⁶ 恰達耶夫認為，俄羅斯文化最悲慘的特質在於他人已視為理所當然的真

將逐一檢視此主導俄國發展之兩股思潮的黃禍認知。

1. 西化派的認知

中國的停滯形象普遍存在於西化派，西化派也擔憂俄國淪落至此。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ii，1811-1848）即認為進步僅存在於歐洲，世界其餘部分則處於停滯；亞洲的社會性萌芽雖早，卻仍停留在初期。但在恰達耶夫與別林斯基的論述裡，中國僅只是落後文明的象徵，尚不至於構成黃禍危害。至於原屬西化派，後因失望而贊同俄國轉向亞洲的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其觀點則相對激進。

赫爾岑認為，資產階級歐洲的發展已至極限，且陷入無益的中國式「平靜」，長此以往，歐洲將變成中國，¹⁷ 故俄國不應重蹈覆轍，而唯一能將歐洲帶出「中國」狀態的只有俄國。俄國之於歐洲，猶如蠻族之於羅馬（Rome），蠻族雖然粗鄙，卻擁有更強大的生命力。歐洲若未能擺脫中國式的腐化，未來將面臨與羅馬同樣的命運，而俄國將扮演新蠻邦的角色。中國也未必就此永遠僵化，或許他日某些話語會如酵母般落入千百萬沉睡的人群裡而喚醒他們。¹⁸ 是故，在他的著作裡不難發現俄國應竭力避免自己和歐洲一樣地中國化（Sinification），甚至應先發制人打擊覺醒中的黃種人論調。

理，俄人卻仍在摸索階段。其因在於俄羅斯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既無過去亦無未來，僅只剩下模仿的文化。正是拜占廷的政教合一才造成這樣的文化真空，俄羅斯脫離西方的文化進程，才會烙上後進性的烙印。要治療俄國這樣的病患，唯有擺脫拜占廷東正教，改接受西方羅馬天主教一途。關於恰達耶夫《哲學書簡》的影響，可進一步參閱王兆徽：〈恰達耶夫「哲學書簡」在俄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俄羅斯學報》（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創刊號（2001年1月），頁1-10。

¹⁷ A. Herzen,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revised by Humphrey Higgens, *My Past and Thoughts: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Vol. 3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68), 1081.

¹⁸ A. Herzen,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revised by Humphrey Higgens, *My Past and Thoughts: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Vol. 4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68), 1725-1726.

索洛維約夫（Vladimir Solovyov，1853-1900）則極度恐懼黃禍，但其指涉卻與時俱進。索洛維約夫以基督教標準考察中國倫理文化和生活方式，認為中國與歐洲的文化雖同義卻不等值。中國生活秩序的真理已失去前進動力，但此正為歐洲協助中國實現真理之時，一如當年基督傳教士對非基督世界的奉獻。中國雖不會占領歐洲，卻是巨大的危險，猶如穆斯林（Muslim）世界之於中世紀歐洲。但基督進步思想在歐洲的體現仍舊不足，而且法國革命與其衍生的激進主義（Radicalism）錯誤，正與反動錯誤的中國主義相抵。歐洲若背棄基督真理，黃禍便可能實現。易言之，他和恰達耶夫同樣認為中國置外於世界文明，也和赫爾岑同樣擔憂歐洲正逐漸中國化，歐洲將因而喪失固有價值信仰，由內部腐蝕其於未來兩個文明世界——歐洲與中國衝突的內在力量。索洛維約夫之後又指出日本已加入西方文明，並認為今日西方對東方與佛教形式的偏好有悖歷史潮流。他更認為日本宗教能振興歐洲之說詭異，並指出或許其內蘊是一股更強大、神秘的力量，日本新佛教也許是基督教最終勝利前的東方逆流。¹⁹

隨著日本崛起，索洛維約夫也益發激進，啟示錄般的〈泛蒙古主義〉（Pan-Mongolism）詩篇終於出現。他將俄國的毀滅比擬為背離基督信仰，而被異族消滅的第二羅馬——拜占廷，毀滅者則是日本糾集中國而成的東方力量：

泛蒙古主義。這字眼雖然野蠻，
我聽來卻相當欣慰，
猶如上帝的神秘預告。

……一群甦醒的部落
預備新的攻擊。

¹⁹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123；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20-21。

從馬來西亞之濱到阿爾泰山，
來自東方島嶼的頭目，
在積重難返中國的長城旁，
集結其群眾。

一如無數的蝗蟲，
一如蝗蟲般的貪得無厭，
在神秘力量的庇護下，
這些部落向北推進。

啊羅斯！忘卻妳舊日的榮耀，
雙頭鷹已被粉碎，
黃色嬰孩玩弄著，
妳旗幟剩餘的碎片。

屈服於令人顫抖的恐懼和驚駭，
誰還能記得信仰的誠律，
第三羅馬既已化為灰燼，
第四羅馬亦將不會再有。²⁰

1900年，索洛維約夫去世當年發表的〈關於反基督徒的簡短敘

²⁰ Э. Л. Радлов (拉德洛夫) под ред., *Письма Владимира Сергеевича Соловьёва, Том III* (索洛維約夫的信—第三卷) (С.-Петербург: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1911), 336-337. 哥爾維策爾談論俄人的黃禍論時，亦曾提及索洛維約夫的〈泛蒙古主義〉，或許中譯本係譯自德文版，而德文版又譯自俄文，故內容與盧金的《熊看龍：俄羅斯對中國的認知與十八世紀以降俄中關係的演變》裡所載者相去甚遠。個人多方蒐尋下，覺得拉德洛夫所編之《索洛維約夫的信—第三卷》裡的〈泛蒙古主義〉詩篇俄文原版，在三個版本交叉比對下，另譯出文中的譯文。哥爾維策爾之中譯版參見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125-126，盧金之英文版可參見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21。

事》（“A Short Narrative about the Antichrist”）則將預言發揮至極致。其提及日本人在未來二十、二十一世紀時，將仿倣西方提出「泛蒙古主義」，日人將一統東亞民族並驅逐外來者——歐洲人，而中日的民族仇恨面對歐洲時就變得毫無意義。中國人也願意接受泛蒙古主義的甜蜜誘惑，由日本軍官指揮的中日聯合帝國龐大勁旅，首先征服俄羅斯，接著是全世界。直至半世紀後，此加諸世界的「新蒙古桎梏」才被推翻。²¹

索洛維約夫的黃禍預言至此已由內部腐蝕轉為外來壓迫，雖說荒誕，卻仍在俄日戰爭（Russo-Japanese War）時被用以宣傳爭取外國支持，並在二十世紀初影響許多俄國詩人和作家甚深，如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i Merezhkovskii, 1865-1941）也認為歐洲的中國化將導致內在腐蝕，而這正是黃禍，俄國也不能倖免。²² 但無論是內部腐蝕或外來壓迫，思想家們的推論其實皆源自與外部的接觸，僅隨著時局現實感受而在歷史記憶裡作不同的衍生預言。

然而，並非所有西化派論者都認為中國是恆久落後與黃禍威脅。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ii, 1828-1889）即認為中國或歐洲皆有停滯或發展的階段，中國的停滯也並非恆久不變，僅是一定條件下的結果。被盧金（Alexander Lukin, 1961-）劃歸於「溫和西

²¹ V. Soloviev,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Bakshy, *War, Progress,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cluding A Short Story of Anti-Christ. Three Conversation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15), 180-185.

²² 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中國的精神基礎是老子與孔子的學說，是十足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是沒有上帝的宗教。中國文學與詩歌除了實用外，別無他途。然而，這樣的文牘習氣卻在1860年代被尊為時尚，它若在我國得到發展，將致使整個民族感染和中國同樣在美學的死亡及精神的僵化與麻木。中國的實證主義已警告歐洲即將到來的威脅，歐洲逐漸步上中國的道路，漸被實證主義，亦即功利的唯物主義（Materialism）所侵蝕。梅列日科夫斯基更警告，中國人是十足的黃色臉孔實證主義者，而歐洲人仍是不完全的白色臉孔中國人……這正是主要的「黃禍」，其並非來自外部，而是出於內部；並非中國進入歐洲，而是歐洲進入中國。盧金對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說法有詳盡的整理，可參見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23-26。

化派」的國際法學家馬爾堅斯（Fedor Martens，1845-1909）與漢學家瓦西里耶夫（Vasilii Vasil'ev，1818-1900）亦屬之。馬爾堅斯雖堅信歐洲文明的優越，卻未忽視中國，並認為中國今日對歐洲的敵視實為西方剝削所致。²³ 瓦西里耶夫則視全人類的文明化為歐洲偉大民族的任務，更為俄國提出解放亞洲，尤其是針對中國的使命；其同時預見中國將成為大國，故建議勿與之為敵，因為強大而工業發達的中國需要俄國的經濟合作，故不會構成威脅。他雖然樂觀，卻仍未忽視中國的軍事威脅，並指出：

如果中國將太平洋的富饒的島嶼拿到自己的手中的話，它就能立刻威脅俄國、美國、印度和西歐。如果它的力量足夠的話，它是可以消滅一切反對者，即便是全世界都反對它。那時候全世界都將布滿了中國人。幻想描繪出來的未來就是如此，今天我們還很難想像它。²⁴

另一被哥爾維策爾歸於「東方派」，而被盧金劃為「極端西化派」者又更為激進。他們強調俄國應向亞洲積極擴張，此一傾向在俄國於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敗北後又更為強烈，認為俄國被歐洲仇視排斥，故應轉向中國實現使命和文明潛力，於是形成西化派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奇特結合。波戈金（Mikhail Pogodin，1800-1875）即認為俄國的亞洲特殊使命是傳播歐洲文化，除籌組十字軍東征（Crusades）教化外別無他法。普熱瓦利斯基（Nikolai Przheval'skii，1839-1888）則遵循啟蒙派傳統，堅信歐洲在道德和科技的優越能抵禦和征服東方。中國雖借鑑歐洲的軍事科技，但精神上卻未必屈服，為此俄國必須全面改造半野蠻的中國人。他更以自身遊歷佐證新疆和蒙古遭中國欺壓已久，故極為期待俄國的救贖；並提及中國工業

²³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26, 36-37.

²⁴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34-37；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110。

發展將造成數以百萬計的失業人口，這些人僅能移居國外謀生，因而危及文明世界的穩定，危害將更甚於歐洲無產階級。馬克西莫夫（Alexander Maksimov，1851-1896）大抵贊同普熱瓦利斯基，並認為俄國過於寬厚，更警告中國未曾、也永遠不會放棄曾屬於己的領土，中國不得已割讓阿穆爾（Amur）和烏蘇里（Ussuri），他日必將取回。馬克西莫夫更認為一個經濟與軍事強大的中國，在未來數十年裡對俄國和全世界的白人將是嚴重威脅；俄國為此應有所準備，以擊退中國軍隊及其半文明計畫。²⁵

對於所謂的「溫和西化派」與「極端西化派」，馬肯吉（David Mackenzie，1927-）認為這些東方客（Vostochniki）鼓吹俄國向亞洲擴張，猶如結合斯拉夫派與復甦民族主義而成的泛斯拉夫主義者（Pan-Slavist）。不偏東方或西方的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係好戰的民族帝國主義，以俄羅斯為尊，而視西方和南方的斯拉夫人為扈從。其巴爾幹理念不出於俄國的非歐洲文化與特質，故俄羅斯註定要發展或兼併亞洲，使歐洲免於黃禍。²⁶是故，上述的溫和與極端兩派立場雖有不同，卻與泛斯拉夫主義殊途同歸。

在西化派與衍生的分支裡，隨著對世局感受不同，將黃禍作為悲觀消極預言或合理化自身使命者皆有。部分後期雖改視日本為黃禍，中國則成為日本附庸，但仍有人認為中國不可忽視，原因在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可供動員，再者為內部崩潰導致人口外移造成的威脅，以及中國他日再起對歷史領土寸土不讓的決心。

²⁵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45-53. 盧金此處列之馬克西莫夫的英譯 A. Ia. Maksimov 有誤，A. Ia. Maksimov 轉譯成俄文為 А. Ж. Максимов，但追溯書中所列之馬克西莫夫的文獻 *Наши задач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我們在太平洋的任務。政治論文集），作者應為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ксимов，亦即應是 A. Ya. Maksimov。

²⁶ David Mackenzie and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 Co., 1993), 435, 442.

2. 斯拉夫派的認知

西化派多數時候雖主導國家的發展，但斯拉夫派十九世紀時卻儼然居上，而中國的停滯也成為當局偏好的穩定象徵。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1796-1855）的謀士，提出「東正教、君主專制、民族性」（Orthodoxy, Autocracy, Nationality）三位一體論（Triad），以防堵西方革命思潮的烏瓦洛夫（Sergei Uvarov, 1786-1855）伯爵，即認為亞洲雖然停滯，但也僅是晚近才落後，而天命選定俄國統治亞洲大片土地與保存各種亞洲文字，正是讓俄國先於其他已開化民族研究東方。俄國與土耳其、中國、波斯（Persia）和格魯吉亞（Georgia）關係的密切，除有利於俄國作為亞洲啟蒙的中介，亦有助於歐洲的穩定。

與烏瓦洛夫相似，斯拉夫派裡同樣有人視俄國為異於歐洲的特殊文明，而中國的形象也被再詮釋以佐證其論點。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 Danilevskii, 1822-1885）即抨擊進步歐洲與落後亞洲的二分法，並指出中國過去的科技與知識正是世代的積累。對於十九世紀支持俄國獨立發展者，中國便成為俄國實現有別於歐洲文明的例證。²⁷

因此，中國和東方的停滯此時在斯拉夫派眼裡未必代表落後，更未必等同於黃禍，有時反倒成為俄國文明獨特性的佐證，與俄國教化亞洲天命的憑據。

甲午戰爭後，黃禍之說在俄國甚囂塵上，此與威廉二世的挑撥不無關聯。威廉二世將黃禍指為日本，並誤導俄國認為中日將聯合入侵西方，其邏輯與西化派如出一轍，唯一的新意僅有佛教的增添。²⁸ 他也坦承為了德國和歐洲文明的利益，而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

²⁷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27-29.

²⁸ 威廉二世曾數度致函尼古拉二世談論國際形勢與黃禍，內容如下：1895年4月16日——威廉二世提及：「我一定要竭盡全力保持歐洲的平靜，並防衛俄國的後方，不讓別人妨礙你在遠東的行動。因為教化亞洲大陸並捍衛歐洲，使它不致於被龐大的黃種人侵入，顯然是俄國未來的偉大任務。」同年7月10日——「歐洲必須感謝你，因為你如此地迅速了解到俄國在教化亞洲、在捍衛十字架和古老的基督教歐洲文化，以抵抗蒙古人和佛教的入侵當中的偉大前途。……在你執行上天賦予你的這項偉大使

(Nicholas II, 1868-1918) 對日本的憂慮，使其允諾俄國將與歐洲共同防範黃種人。²⁹

德裔俄籍政論家布隆霍佛 (Hermann Brunnhofer, 1841-1916) 當時也刻意宣傳黃禍，並認為德俄歧異在面臨重大任務時自會消弭。甲午戰爭時，他即指出日本有在遠東同中國和朝鮮結盟的野心，而且霸權將推及印度。其雖承認日本當時未熱衷於佛教，卻仍以爲戰時凡事皆有可能。日本若順利組成佛教政治聯盟，將可能要求在西方同等的傳教權利，此將導致基督教歐洲在東亞傳教的破產，而俄國所受的威脅將遠甚於他國，因其邊境沿線幾乎都是佛教宗支的鎖鏈。服從佛教而高度工業化的中國將是惡魔，保護西方國家不受東亞洪水淹沒的歷史任務，因而將重新降臨於俄國。³⁰

有識之士於 1880 年代雖然呼籲別誤信德人爲俄國編造的歷史使命，而落入其煽動的黃禍圈套，並認為俄國應重回 1870 年代的斯拉

命期間，我將不讓任何人試圖妨礙你並在歐洲從後方攻擊你。」同年 9 月 26 日——「遠東事態的發展，特別是它對於歐洲和我們基督教信仰的危險，是自從我們在今春採取第一個共同行動以來，一直讓我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最後，我的想法發展成某種形式，我把它在紙上畫成一幅草圖。我會同一位藝術家——一位第一流的畫家——把它詳細描繪出來……這幅畫顯示，歐洲列強以它們各自的守護天神爲代表，在天使長米迦勒 (Arch-Angel Michael) 的召集下聯合抵抗佛教、異端和野蠻人的侵犯，以捍衛十字架。」1902 年 9 月 2 日——「日本的山井 (Yamai) 將軍——前日軍駐華司令——被派任於日本駐北京公使館，以便處理中國陸軍的改組事宜——亦即爲達到把其他國家的所有人趕出中國，此一個未公開言明的目的……2,000 萬至 3,000 萬受過訓練的中國人，由六個日本師團加以協助，並由優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軍官指揮，這個前景觀察起來不得不讓人焦慮，而這並非不可能。事實上，這正是我前些年所描繪的黃禍，而它正成爲現實；由於那幅版畫，我曾遭到多數民眾的嘲笑。……」參見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0), 10, 13, 16-17, 86。

²⁹ *The Kaiser's Memoirs, Wilhelm II, Emperor of Germany, 1888-1918*, English translated by Thomas R. Ybarra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22), 79-80.

³⁰ 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 103、115-116。

夫熱潮，但顯然無濟於事。³¹

十九世紀末，烏赫托姆斯基（Esper Ukhtomskii，1861-1921）侯爵與藏醫巴德馬耶夫（Petr Badmaev，1851-1920）關於俄國在亞洲影響無限的觀點蔚為風行，尼古拉二世因而對中國和遠東改採積極政策。其論點係對東方文明的推崇與俄國統治亞洲，尤其是統治中國的怪異結合，形成獨特的俄國彌賽亞主義（Messianism）——俄國既是東方的保護者，使東方不受歐洲影響，但又對亞洲傳播基督教。

烏赫托姆斯基認為，亞洲各國有不亞於西方的獨特文化，與俄國同樣信仰超自然力量，故為俄國對抗西方的天然盟邦。但被西方喚醒的中國，將運用西方的武器戰勝、超越，甚至毀滅西方。為此，俄國不應將西方文明帶進東方，而應使東方認同和它接近的專制制度；俄國也應承認其亞洲本質，並與亞洲結合成專制反西方陣營。除作為結合東西方的力量外，俄國別無出路，因為西方遲早會壓境，而甦醒的亞洲民族也將構成比西方更大的危害。巴德馬耶夫則認為中國人歷來愛好和平，故慣於異族的統治，因此建議俄國派兵占領中國，蒙古、西藏和中國的貴族將會請求沙皇恩賜國籍，因為沙皇會按基督教精神人道地統治亞洲人。³²

³¹ 一位署名 N. S. 者即於《俄羅斯思想》1882 年第 1 期發表〈關於俄國和德國的東方政策同斯拉夫問題的聯繫筆記〉，指出德國人竭力通過巧妙的陰謀和幕後交易，將我們的斯拉夫政策引入歧途，很遺憾他們總是成功。在德國為我們編造的新歷史使命裡，俄國政策的重點不應在歐洲，而是在亞洲，並將歐洲文明傳播給亞洲各民族。又因為德國忌憚英國以印度為支柱的海上優勢，因此我們的亞洲使命據說還包括「解放」印度的義務。參見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 106-107。

³² Э. Ухтомский, (烏赫托姆斯基) *К событиям в Китае.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Запада и России к Востоку* (論中國局勢：西方與俄羅斯對東方的態度)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Восток, 1900), 71, 85-87; П. Бадмаев, (巴德馬耶夫) “О задачах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азиатском Востоке,” (俄國東亞政策的使命) Б. С. Гусев (古謝夫), *Петр Бадмаев: Крест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а, целитель, дипломат* (彼得·巴德馬耶夫：皇帝的教子，醫生和外交官)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0), 241-248, cited in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29-32.

是故，在日本被德國冠上黃禍之名時，東方或中國又變成斯拉夫派認定的天然盟友，因為彼此有著共同特質：信仰超自然力量和君主專制。但俄國依舊擔憂它們被西方喚醒而反噬歐洲，故該有的提防亦未稍減，故中國雖無黃禍之名，但仍有黃禍之實。

斯拉夫派原係民族自覺而生的思潮，但在內外激盪下卻蛻變出強調俄國亞洲使命，甚至和帝國主義結合成為另一種理念，此與西化派的發展極為相似。於是，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方，也隨著訴求不同而不時被變換定位，時而是黃禍，時而是盟友。黃禍對斯拉夫派既是威脅，亦為實踐其天命的合理憑藉。

俄國雖也被西歐視為黃禍，但俄國內部無論是斯拉夫派或由其衍生者，也和西化派同樣以西方思維詮釋黃禍，並在帝俄最後十餘年裡，皆因日本崛起而視日本為主要黃禍，中國則因為人口優勢有被動員的可能，而被視為次要者。斯拉夫派與西化派的差別，則在於對斯拉夫民族優越性的強調，並自恃第三羅馬（Third Rome）榮耀，認為俄國從拜占廷接收了基督教正統，³³ 又有許多西方文明所無的優良特質。中國對斯拉夫派或許是威脅，但只要在被征服的前提下便會成為

³³ 西元十五世紀起，莫斯科大公在民族意識覺醒後，便不願在教會事務上依附拜占廷。在此之前，俄人亦慣於傲慢、懷疑地看待希臘人，原因在於君士坦丁堡派來的人選既不優秀，亦無法展現牧師的影響力，僅滿足於教會表面的富麗堂皇和虔誠王公們的熱忱，並竭力將財富攜回自己國內。1439年佛羅倫斯會議對東正教與天主教合併的決議，更被俄人視為對東正教的背叛，歪曲古羅斯的虔誠。君士坦丁堡淪陷便被俄人視為希臘東正教傾覆的最後標誌。於是在羅斯的心目中，東正教的東方光芒黯然失色，無論第一羅馬因異端和傲慢而傾覆，抑或第二羅馬因反覆無常和不信神而傾覆亦然；當拜占廷將伊斯蘭教的枷鎖套於己時，莫斯科也擺脫了拜占廷的壓迫。羅斯是第三羅馬和最後一個羅馬，是世上正確信仰、真正虔誠的最後唯一避難所。菲洛費（A. Filofei, 1465-1542）在寫給瓦西里三世（Vasili III, 1479-1533）的信裡便提到：「注意這事，虔誠的沙皇！兩個羅馬滅亡了，第三個——莫斯科屹立著，而第四個不會再有。我們全體教會在你強大的王國裡，因為信宗教而閃耀著光芒，而且遠勝於太陽；所有東正教王國集結在你獨一無二的王國裡；在地上，只有你是基督教沙皇！」詳見 Ключе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часть III*, 273-275。

助力。

3. 誰是黃禍？

俄日戰爭期間，俄國曾組織大規模的黃禍宣傳戰，強調日本勝利的危險，呼籲只有歐洲團結方能因應。此次宣傳不同於前述保護俄國與歐洲免受日本領導之千百萬亞洲人的威脅，煽動者亦非主張俄國與亞洲結合者。誠如哥爾維策爾所言，此時使用黃禍這個口號顯得既平淡又可笑，但黃禍一詞仍被大量反覆運用。³⁴ 黃禍此時又因國際時局而被移植於亞洲的反歐洲運動，並派生出不同新義。黃禍此前在不同流派裡的詮釋儘管莫衷一是，但及至帝俄末年，俄國內部對黃禍的議論已更為務實，從思想家的推論轉而在實務裡獲得初步印證。

曾參與俄日戰爭，後為內戰期間白軍（White Army）司令之一的鄧尼金（Anton Denikin, 1872-1947），其對東方威脅的見解便與眾不同。他以為俄國向來明智、親善的中國政策，從十九世紀末起便未符國家利益，修建中東鐵路、租借遼東半島更是冒險作為。鄧尼金視中日聯合為「東方即將到來的威脅」，認為俄國僅能維持現狀，故應持續對中國友好，但仍要強化在遠東的駐軍，增加在當地的人口。³⁵

尼古拉二世的戰爭大臣、俄日戰爭期間的總司令庫羅帕特金（Aleksii Kuropatkin, 1848-1925）則在戰敗後提出警告：

……讓日本在滿洲戰場取得絕對的勝利，大抵不符歐洲的利

³⁴ 俄國《新時代報》在此次宣傳裡起著領導作用。一位化名為阿爾古斯的政論家即於1904年詳述亞洲的覺醒與泛亞洲運動，並描繪其於1900年至1902年間在倫敦和東京所親身經歷的泛亞洲主義集會情景。其他國家報刊如《光明報》、《歐洲人報》與《外交和殖民地問題報》皆以轉載《新時代報》的文章，表達對俄國的支持。《印度支那評論》在俄日戰爭後連續轉載聖彼得堡的《論壇雜誌》〈東方的危險〉一文。《巴黎回聲》則發表所謂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的計畫。俄國除在報刊宣傳外，還採取在歐洲各國首都舉行報告會的形式進行宣傳。參見哥爾維策爾：《黃禍論》，頁116-117。

³⁵ Антон Деникин, (鄧尼金)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俄中間題，軍事政治隨筆) (Варшаве: 1908), 7-8, 12-13, 30, 37, 55, cited in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41-42.

益。戰勝的日本可能會聯合中國，並高舉「亞洲人的亞洲」大纛。淨空歐美在亞洲的企業將是此一新興大國的初始目標，而將歐洲人驅逐出亞洲則為其最終目的。

……和議的締結無異承認日本在亞洲征服了俄國，這不僅對我們，而且對在亞洲擁有屬地和利益的列強都有嚴重的後果。不久前才預見的「黃禍」，現已成真。日本雖取得勝利，卻仍在急速擴充兵力，而中國則在日本軍官的指導下，仿倣日本模式建立一隻龐大的軍隊。中國和日本短期內便能將超過150萬的大軍開進滿洲，若是針對我們而來，它便會從俄國奪取西伯利亞大片的土地，使我們淪為二流國家。³⁶

對甫敗戰的庫羅帕特金而言，黃禍自是日本，中國則是在日本麾下進軍俄國與歐洲的次要黃禍，此與西化派或斯拉夫派裡曾出現的說法實無二致。至於滿洲，俄國又該如何對待？他認為：

……兼併滿洲極其不宜，更遑論奪取此一中國最重要的省份將永遠破壞兩國自古以來的和睦。此將導致許多滿洲人移居我們的領土，遷入俄人仍舊稀少的阿穆爾與烏蘇里區，而且我們的領土將會被湧入的黃色浪潮淹沒。東西伯利亞將徹底非俄化，而必須記得的是，只有俄羅斯人現在會構成，而且將來也才會構成我國人口的可靠成分。中國人如此湧入濱海——阿穆爾區，無疑將提升當地的農業水準並將荒漠變為花園；但西伯利亞的剩餘土地同時也將落入非俄羅斯人之手……。³⁷

³⁶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Being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Military Policy and Power of Russia and on the Campaign in the Far East. By General Kuropatkin Vol. 2*,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and edited by E. D. Swinton, D.S.O., R.E.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09), 195, 200-203.

³⁷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Being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Military Policy and Power of Russia and on the Campaign*

庫羅帕特金的中國威脅認知，主要在於中國龐大人口對俄國新近取得領土的壓力。他雖被削職，卻洞見俄國東疆的不足。但俄國戰敗後亦習得教訓，轉而改善俄日關係，由於兩國皆欲保護自己的亞洲利益，故彼此締結了夥伴關係。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則促使俄日達成協議。³⁸ 日本雖仍是俄國遠東潛在的黃禍威脅，但迫切性似已未如中國。

1913年，庫羅帕特金再論己見，除同意威廉二世的亞洲反歐洲運動為黃禍外，更倡言俄德奧應協議巴爾幹問題，建立團結的歐洲以面對與黃種人未來的衝突。³⁹ 至於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向滿洲和蒙古的移居，不但是黃種人向歐洲文明的新一輪進攻，也是當代黃禍的第一次呈現。⁴⁰ 他為此警告中國似正準備奪回濱海與阿穆爾流域邊疆區：

西伯利亞與遠東各州今後は俄國領土抑或失去，取決於二十世紀俄國人與中國人在9,000公里邊界的關係。

……我們應記得187年前中國人已主張占領整個西伯利亞至托博爾斯克(Tobol'sk)，這樣的危險顯而易見，並危及俄國的生存。不待中國發展進攻俄國的能力，俄國的權利與義務也同樣明確，亦即直接占領亞洲障地，不僅是為下一代保留兩百年

in the Far East. By General Kuropatkin Vol. 1,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and edited by E. D. Swinton, D.S.O., R.E.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09), 70-72.

³⁸ Mackenzie and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492. 俄國與日本前後又於1907年、1910年與1912年簽訂三次密約。第一次密約裡，兩國各自劃分南北滿為其勢力範圍，並相互承認彼此於朝鮮和蒙古的特殊利益；第二次密約除重申互保利益與先前南北滿界限外，並締結相似於攻守同盟的協定；第三次密約除再確認南北滿界線外，又將內蒙古劃分為東西兩部，並約定為各自的勢力範圍。

³⁹ 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 (庫羅帕特金)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俄中問題) (С.-Петербург: Спб., тип. т-ва А. С. Суворина. 1913), 215, 210-222.

⁴⁰ Куропаткин,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72-73.

前在亞洲所取得的應有權利，更是黃種人和白種人一旦衝突的勝利保證。俄國儘早占領這些障地，不但是我們的利益，也是全歐洲的利益。黃種人與白種人間的第一次衝突已發生於滿洲之地。⁴¹

庫羅帕特金所言的危機亦非全然空想。依馬肯吉（David Mackenzie, 1927-）之見，俄國一戰（World War I）前在遠東的地位因俄日關係的改善而極為穩固，⁴²亦即日本的軍事黃禍威脅已暫時化解，但中國移民黃禍卻仍方興未艾。故也不難理解何以庫羅帕特金從戰敗後對黃禍成真的感觸，又轉而認為中國人向滿洲和蒙古的移居，是當代黃禍的首次呈現。

二十世紀初，俄國各界對中國向遠東地區移民的恐懼格外強烈，中國人常被視為間諜或鄰國敵後潛在嚮導。俄國當局也擔憂中國人和朝鮮、日本移民的湧入，將使其喪失對東疆的控制。隨著俄日戰事頓挫俄國遠東威望，這樣的恐懼又更為強烈。⁴³

綜觀帝俄最後十年，日本和中國先後在不同範疇裡扮演黃禍威脅。彼時孱弱的中國當然不被視為軍事威脅，軍事意義的黃禍主要來自日本，但中國移民此刻亦為尖銳的實質問題。輿情如此，當局自亦不能充耳不聞，首相斯托里賓（Petr Stolypin, 1862-1911）便採取措施推動農民東徙，此固然為其削弱公社與發展土地私有制的配套，但戰略考量也同樣重要。1908年3月，斯托里賓在國會敦促興建阿穆爾鐵路時亦曾提及，俄羅斯遙遠又嚴峻的邊地不僅富饒，盛產黃金、木材與毛皮，又寬廣適宜耕種。然而，在有人口密集的國家為鄰的情況下，這塊邊地將不會持續荒蕪。俄人若不在外人滲入前加緊開發的話，未來某一天，這塊富饒的邊地可能只會在名義上屬於俄羅斯了。⁴⁴

⁴¹ Куропаткин,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75, 181.

⁴² Mackenzie and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492.

⁴³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61.

⁴⁴ “Речь о сооружении Амурск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произнесенная в

斯托里賓並非危言聳聽，中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確也開始有計畫地遷徙人民至滿洲，以遏制帝俄的擴張。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Convention of Peking）簽署後，清廷即逐步開放漢人移居滿洲；1871年俄國入侵伊犁後，清廷更加快開放速度，甲午戰爭失利後又更甚；1905年日本擊敗俄國後，清廷則對漢人開放滿洲最後一塊區域。中國的反制也確實奏效，俄國即因滿洲南部居住大量漢人而有不再南進的考量，並開始驅趕黑龍江畔劇增的中國人。⁴⁵1886年，俄國當局禁止外國人在邊境地區定居，1892年更取消外國人於阿穆爾和濱海地區的購地權；⁴⁶更首度留意兩國邊界一帶人口的懸殊對比。⁴⁷俄國雖了解自身在遠東的戰略弱點，卻仍有因邊界人口失衡，東方游牧民族可能在十九世紀晚期席捲西伯利亞，甚至進入歐俄的擔憂。即令是當時的溫和派，主導西伯利亞事宜的庫勒姆林（Anatolii Kulomzin, 1838-1924）也敦促沙皇儘可能遷移農民至遠東，以對抗黃種人的人海浪潮。⁴⁸二十世紀初，俄國當局亦因中國人在當地的非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31 марта 1908 года,” (1908年3月31日在國家杜馬關於阿穆爾鐵路建設的演說) 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費爾世蒂斯基) под ред.,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1906-1911* (我們需要偉大的俄羅斯……：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里賓1906年至1911年於國家杜馬暨國務會議演說全集)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1), 119-129.

⁴⁵ Sarah C. M.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180-181.

⁴⁶ Александр Ларин, (亞歷山大·拉林) *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中國人在俄羅斯)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35, cited in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59.

⁴⁷ 根據1897年的俄國官方人口普查，當時在阿穆爾與濱海區的俄人總數為21萬3,287人，中國人為4萬3,000人，朝鮮人則為2萬6,000人，外來族群占總人口的32%，但一線之隔的中國滿洲早在1895年即已超過600萬人。參見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196。

⁴⁸ Steven G. Marks, “Conquering the Great East: Kulomzin, Peasant Resettle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iberia,”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法活動猖獗，而頒布公私部門禁用外國人法令以杜絕後患。⁴⁹

早在黃禍一詞被濫用前，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即呼籲應防備中國人入侵，並主張應趁亂直取中國，否則東方的巨大威脅將無可避免。他認為中國的危險在於其龐大的人口：⁵⁰

他們十分擁擠地居住在帝國境內，於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擋之勢大批向外移民，有些人遷往澳大利亞，另一些人渡過太平洋，遷往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還有大批的人最後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動。然後呢？然後，轉眼之間，西伯利亞，從韃靼海峽（Tartar Strait）到烏拉爾山脈和直至裡海（Caspian Sea）的整個地區就將不再是俄國的了。試想在這塊相當於法國面積（50萬8,600平方公里）20倍以上的1,222萬平方公里遼闊土地上，至今居民不超過600萬人，其中俄羅斯人僅約260萬人，其餘都是韃靼或芬蘭族系的土著，而軍隊人數更是微不足道，怎樣能阻止大批中國人的侵入——他們不僅將充塞整個西伯利亞（包括我們的中亞細亞新領土），而且還將越過烏拉爾，直抵伏爾加河邊！

是故，中國對俄國東疆的人口壓力一直存在，日本崛起對俄國構

M.E. Sharpe, 1995), 27. 庫勒姆林於1883年至1902年間一直擔任大臣會議（Committee of Ministers）行政秘書一職；1892年又被時任交通大臣的維特（Sergei Witte, 1849-1915）指派管理從屬於沙皇，負責籌建跨歐亞鐵道的臨時最高機構——西伯利亞大鐵路特別管理委員會，兼管西伯利亞大鐵路所有的附屬企業，如西伯利亞水運的改善、西伯利亞工業的擴充，以及農民移居的協調，形同集西伯利亞殖民事宜大權於一身。參見 Marks, “Conquering the Great East,” 25.

⁴⁹ Viktor Larin, “‘Yellow Peril’ Agai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95), 297.

⁵⁰ 巴枯寧：〈俄國巴枯寧論「來自東方的危險」〉，收於呂浦、張振鵬：《「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頁2-4。呂浦譯自 A. Lehning, *Archives Bakounine II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 (Leiden: E. J. Brill, 1967), 81, 83-84, 280, 281-283.

成軍事威脅後，才一度取代中國而躍居黃禍首位。但直至俄日戰爭爆發前夕，俄國仍舊輕蔑日本，及至戰敗才有所警覺，⁵¹ 轉而改善俄日關係。因此，更精確的說法應是從十九世紀中葉至帝俄傾覆的逾半世紀裡，中國人口壓力在絕大多數時候雖多無黃禍之名，卻有黃禍之實，僅未如日本軍國主義（*Militarism*）黃禍那樣引人側目。再者，從思想家的推論到實務的印證亦可得知，其間俄國與東方文明的交流非但未能消弭黃禍恐懼，反倒鞏固彼此的隔閡與猜忌。

（二）蘇聯時期的隱諱

蘇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時期的黃禍認知有一定的延續性，因為蘇聯此時在遠東面臨的威脅與帝俄時期幾近相同，仍是中國與日本。然而，囿於共黨意識形態，蘇聯必須否認其有所謂的種族偏見，故黃禍一詞反倒成為隱諱，但並不代表它不存在。我們若梳理此一階段與帝俄時期的歷史脈絡連結，即能發現黃禍的成因仍在，本質亦無差異。如蘇維埃（*Soviet*）政權逐漸穩固後，也開始對「黃色」僑民流入邊區感到不安，外交人民委員部最後於1926年1月5日決議：必須採取所有可行措施，禁止中國人和朝鮮人的流入。⁵²

二十世紀初至二戰（*World War II*）期間，日本仍是蘇聯在遠東的主要敵人。1930年代，史達林為防範日本滲透曾大規模肅清遠東區（*Russian Far East*），但當地中國人也遭池魚之殃。⁵³ 1939年諾門

⁵¹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197.

⁵² 張宗海：〈謬種流傳的「黃禍」論——中國人難以在俄羅斯立足的歷史根源〉，收於關貴河、欒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09-110。

⁵³ 1937年前，遠東區仍有為數眾多的中國人與朝鮮人居住於此，並從事貿易與農業。1930年代起，史達林為防範日本滲透，故於當地進行大規模的驅逐與遷徙活動。據現有可得資料顯示，1938年在海參崴的中國人除遭到驅逐外，還有人被以非法越境的罪名判刑勞改，更甚者則被控以間諜罪名處死。在最後一批約1.9萬名中國人於1938年被驅逐後，中國人

罕戰役（Battle of Nomonhan）後，蘇聯此後即無東戰場，更迫使日本轉向南進。

但兩國戰後仍有經貿合作，而且成果豐碩；1970年代，日本已是蘇聯最大貿易夥伴，西德雖後來居上，但日本仍居第二；1980年代蘇日合作則蹣跚前進，除反映蘇聯忽視兩國僅2%的貿易量，亦與日本無意依賴蘇聯進口，或擔憂因而間接強化蘇聯軍事能力的考量有關。⁵⁴此外，日本淪為戰敗國後的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儘管主要針對蘇聯，但在冷戰對峙下，實與帶有種族偏見的黃禍無關。因為從共黨意識形態觀之，他人若非無產階級友人，即為資產階級敵人。是故，非社會主義國家——日本原本即為敵人，⁵⁵無論其奉行軍國主

數量已不及當地人口的1%。參見 П. 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科羅維亞科夫斯基) “Китайцы жертвы сталин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中國人——史達林鎮壓的犧牲品)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2 (1991), 142-145, 以及 John J. Stephan,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3。

⁵⁴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After Communism: Resources for Cooperation or Confrontation,”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95), 187.

⁵⁵ 以意識形態作為判定敵友的標準，在赫魯雪夫的回憶錄裡有詳細陳述。他指出二戰期間，蔣介石雖與中共有磨擦衝突，但蔣介石是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中國解放的重要進步力量。再者，日本當時是蘇聯在遠東的頭號敵人，為了維護蘇聯的利益，所以必須支持蔣介石，我們支持他只是不願見到他被日本擊敗。一如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二戰期間支援蘇聯對抗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但他自始自終都是蘇聯的敵人，並不意味邱吉爾在某種程度接受蘇維埃政權。促使邱吉爾與蘇聯結盟僅是當時世界局勢和他對英國利益的考量使然。從赫魯雪夫的說法可知，對共產黨人而言，敵人固然可因一時權宜而化敵為友，但終歸仍是敵人。赫魯雪夫的說法參見 N. S. Khrushchev,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237-238；尼基塔·謝·赫魯曉夫著，述弢、王尊賢、袁堅、范國恩、郭家申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243。

義威脅蘇聯，或戰敗仍具潛在威脅亦然。⁵⁶

反觀稱不上威脅的中國則是蘇聯圖謀的對象。中共建政後雖成爲蘇聯無產階級兄弟，但兩國自1950年代後期卻漸行漸遠，最後甚至兵戎相見。因此，相較於日本，蘇中共從無產階級兄弟變成修正主義（Revisionism）敵人的歷程，反而更能突顯黃禍本質爲何。

1. 共產黨人的黃禍認知

蘇共初期雖視中國爲反動、非革命政府，但對在蘇聯的中國人則切割處理，並視之爲鄰國無產階級友好代表，無須爲他們國家的政策負責。但日本占領朝鮮後，中國人與朝鮮人卻一度被視爲日本潛伏於遠東區的第五縱隊（fifth column）而遭受迫害。然而，1920至1930年代在蘇聯的中國人給俄人的印象卻相當正面，並持續近一個世代。1950年代，蘇聯開始大力宣傳兩國牢不可破的友誼。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雖未完全信任毛澤東，卻仍視中國爲最重要的盟友，認爲中國應作爲亞洲世界革命中心，且必須擁有足夠的威望與強化鞏固，才能實現革命任務。⁵⁷

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則一改其前任的對華政策，除支持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加速，還廢除此前的不平等協議。1953年至1957年間是蘇中共在意識形態與政治最相近的時期，但自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雙邊裂痕便逐漸浮現。儘管蘇共未以黃禍攻訐中共，但舊日引發黃禍聯想的爭議卻陸續出現。

作爲世上第一個共產國家，蘇聯如何看待黃禍令人玩味。對共產黨人而言，人種及膚色區別並無意義，人際間僅有階級的差異。此由赫魯雪夫與法國前總理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 1884-1970）的對話即可明瞭：

⁵⁶ 赫魯雪夫於回憶錄裡即清楚提到，蘇聯之所以促成中國的工業發展與經濟援助，除爲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外，也是爲了對抗蘇中的共同敵人——日本，日本雖然被擊敗了，但仍具潛在威脅性。參見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46。

⁵⁷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97, 102-103, 117, 121.

達：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已遊歷這個國家並見到你為中國人所做的一切美好事物。你有想過在促進他們經濟發展時，你也可能在替自己製造危險嗎？

赫：不，我們並未見到任何危險。相反地，我們相信我們在做正確的事。中國人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兄弟。

達：你不擔心黃禍嗎？全歐洲——事實上，是全世界——人們都在談論黃禍。你不覺得受到它的威脅嗎？

赫：達拉第先生，我必須告訴你我們觀點的差異。我們並不會因為皮膚的顏色而歧視他人。我們並不在乎他們是否為黃的、白的、黑的或棕的。對我們而言，事情的唯一區別只在於階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中國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誠摯而且樂於協助他們——對我們而言是有利的，而且由於我們的階級團結一致，使我們得以維持友善和兄弟般的關係。⁵⁸

達拉第不久後即辭世，赫魯雪夫坦承達拉第若活得夠久，便能見證他與毛澤東（1893-1976）的衝突，並嘲笑他的反駁。但赫魯雪夫仍認為中國的作為與黃禍無關，而是毛澤東所致。他相信蘇聯播種的友誼果實，未來將會開花結果；毛澤東終有一日會離開人世，中國人屆時也將回歸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鋪設的正軌。⁵⁹

赫魯雪夫將中國人與毛澤東切割，且澄清並無黃禍，但真否如此？從對話即足以證明赫魯雪夫已間接承認達拉第所指的黃禍為中國，否則又何須駁斥，其否認只因囿於意識形態。此外，由其回憶錄亦能探知他對亞洲人的真正觀感，他提到：⁶⁰

⁵⁸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90-291.

⁵⁹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91-292.

⁶⁰ N. S. Khrushchev,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461-462.

政治是場遊戲，而毛澤東以亞洲式的狡猾，依其個人的誘騙、背信、野蠻復仇和欺騙規則參與其中。在我們看穿他的把戲前，他已欺騙我們好些年。塔列蘭（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曾說過外交官有副能隱藏想法的口才。此理亦同於政客，而毛澤東一直是隱藏其想法與意圖的大師……。

赫魯雪夫無意間更曾透露他認為中國人是善於偽裝的民族。他認為中國人即便生氣也不露聲色，也不表現對事物的真實看法。⁶¹ 至於中國真的是俄國的兄弟嗎？在赫魯雪夫眼裡，兩國猶如咫尺天涯：⁶²

你可以說中國離我們很近，但又離我們很遠。它是與我們毗鄰的鄰居，而且有共同漫長邊界。但它同時又是相當遙遠的鄰國，中國人與我們鮮有共同之處。

赫魯雪夫雖然將毛澤東與中國人民切割，但無意間卻已流露其認知——狡猾的亞洲人與善於偽裝的中國人，其無產階級兄弟神話終究不敵種族隔閡。

赫魯雪夫時期是蘇中關係的轉捩點，後續衝突的激化亦由此延續。因此，釐清該階段乃至於後續衍生的爭議，將有助於黃禍本質的探知。

2. 引進中國工人爭議

1954年赫魯雪夫率團初訪北京，並向毛澤東建議引進百萬名，甚至更多的中國工人至西伯利亞協助開發，此既解決蘇聯的勞力短缺又化解中國嚴重的失業問題。未料毛澤東的反應冷淡：

您知道，赫魯雪夫同志，多年來由於人們認為中國是個不發達、人口過剩而且有許多失業者的國家，中國因而被視為廉價

⁶¹ 赫魯雪夫：《赫魯雪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頁2278。

⁶²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35.

勞動力的供應者。但您知道嗎？我們中國人認為這是種侮辱，您的要求相當令人尷尬。倘若我們接受您的提議，旁人可能會誤解蘇聯和中國的關係。他們可能會認為原來蘇聯也和資本主義西方同樣地看待中國。⁶³

赫魯雪夫困窘不已而僅能致歉，代表團同時決議蘇聯未來將獨力開發。未幾，中國卻又重提並解釋先前僅是表達己見，並理解蘇聯的需求而願意協助。赫魯雪夫為免橫生枝節，故與中國簽訂初期引進20萬名勞工的合同。

但赫魯雪夫隨即發覺其擔憂實為多餘，並認為兩國關係未來將遭遇困難，因為他發現毛澤東滿腦子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並認定中國人優越於他人，⁶⁴而同化外人之說，更強化他日後認定對方意圖藉由和平手段占領俄國領土的信念。

蘇聯後來發現國內勞動力其實過剩，因而未再主動提出要求，但中國卻開始表示願提供兄弟般的援助。赫魯雪夫不得不致歉表示先前估算錯誤，蘇聯並不需要這麼多人力，同時確定中國工人約滿後即返國，也不再引進。赫魯雪夫最後作出如下結論：

我們逐漸形成一致的看法，認為中國人意圖兵不血刃地占領西伯利亞，滲透、接管當地經濟，使中國移民在西伯利亞的數目超過俄人和當地其他民族，並扎根於遠東地區。簡言之，他們

⁶³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49；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頁2257-2258。現行的赫魯雪夫回憶錄係他人根據赫魯雪夫的口述資料整理而成，由於口述資料是跳躍式的回憶片段，並非井然有序地呈現，整理者為讓讀者易於理解，因而依據議題分類歸納。但既然是整理者的主觀判定，不同版本的內容雖大致相同，細節卻難免有所出入。如中文版的回憶錄雖然號稱是全譯本，卻仍有若干英文版的內容未見於中文版。為力求完整，個人在議題的論述與說明時，當發現不同版本間有些許出入時，將交叉比對兼採兩個版本，以截長補短、互補不足。

⁶⁴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83；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頁2259。

意圖使西伯利亞的中國人多於俄人，此一策略顯而易見卻未奏效。我將毛澤東的有趣手法再次重述：他起初說我們的建議讓中國人民難堪、屈辱，但他後來卻堅持讓我們多要些人，如果需要，他們還能追加。⁶⁵

赫魯雪夫雖仍未以黃禍指稱任何人，但其間顯露的憂慮——中國移民在西伯利亞多於俄人，抑或滲透扎根於遠東地區，實已是帝俄末年人口擴張黃禍論的翻版。

3. 歷史疆界爭議

疆界爭議亦於此時浮現，聽聞傳媒報導中國人不滿沙皇以武力強加邊界於中國，尤其是占有海參崴後，赫魯雪夫訪問北京時亦曾詢問，中方則淡然表示無須理會並指責此為資產階級之見，⁶⁶但後續發展卻非如此。

隨著蘇中共關係惡化，中共開始提出領土要求，並指責蘇聯兼併周邊在一戰前曾屬帝俄的領土，進而控訴蘇聯推行帝俄侵略政策。赫魯雪夫則以為蘇聯若放棄自帝俄繼承的領土，將自陷於歷史混淆與政治爭執的絕望糾葛，而目前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將喪失自身領土，只因他們來到一塊不屬於自己祖先的土地。這些人都是在從前某個時候來自某個地方而今日定居於此，總不能現在將他們趕到月球上。邊界問題是個死議題，中國刻意操弄僅為向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遂行侵略。赫魯雪夫指出爭議起於當年訂約以中國沿岸為界，而非國際慣例的航道中線。是故，只要有島嶼形成自然就屬於俄國，但俄國仍顧及

⁶⁵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50；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頁2262。

⁶⁶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84-285；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頁2253。對於蘇共是否曾要求中共公開發表聲明說明中方立場，不同版本的回憶錄略有出入。英文版指出蘇共要求中共澄清，但中共拒絕，所以蘇共也不再堅持；中文版則是蘇共希望得到澄清說明，但後來並未提出要求。因為無從覓得俄文版查證，故僅能作一陳列對照。

中國人民的生活需求。他強調蘇聯願以國際慣例解決，後來卻因中國的不合理要求與未有回應而作罷。此即北京要求莫斯科（Moscow）在條約文本承認中蘇邊界係於過去非法、不平等的基礎上形成。⁶⁷他直言任何主權國家都難以接受這樣的要求，蘇聯若同意即無異得放棄所獲得的領土。⁶⁸赫魯雪夫強調他不偏袒沙皇，但也無意為沙皇負責。蘇聯的邊界是合法沿襲而來，蘇聯也不是第一個必須捍衛自革命前政權所繼承領土的社會主義國家，若根據歷史考量修訂蘇中邊界反倒會挑起不睦。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者不應侷限於邊界問題，況且疆界在奪取全世界最終勝利的革命事業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的哲學框架裡並無意義。⁶⁹

對共產黨人而言，既然國家最終將會消亡，疆界確實並無意義，但赫魯雪夫顯然低估俄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傷害。俄人以在英法聯軍調停有功為由，而取得中國廣大的北疆，但兩國對俄國角色的認知卻有極大的落差。如馬爾堅斯即以爲中國人感激、信任俄人，此亦爲蘇聯學界普遍的認知。⁷⁰但實情卻非如此，銜命談判的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1833-1898）在奏摺裡即言明與俄人周旋實爲無奈：

⁶⁷ 相對於赫魯雪夫的說法，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前研究員倪孝銓對此段歷史的陳述爲：中國在1964年時表明願以既有條約爲基礎解決邊界問題，而不要求歸還帝俄自中國所得的土地。但中國堅持蘇聯必須承認十九世紀的條約是不平等的，而且俄國所得領土亦是以侵略手段得來。由於蘇聯領導階層拒絕接受，談判因而失敗。至於十九世紀時的條約則並未載明以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中國沿岸爲界，而是蘇聯在日本侵害中國東北時，單方面擅自將邊界推至中國沿岸，但中國從未認可蘇聯此舉。參見 Xiaoquan Ni,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 and Policies towar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Judith Thornton and Charles E. Ziegler eds.,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WA: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383-384.

⁶⁸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pp. 286-289；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頁2308-2309。

⁶⁹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284-285.

⁷⁰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95.

恭親王又奏，俄首伊格那提業幅（Nikolai Ignatyev，1832-1908），前以暎嘑兩夷換約，頗有居功之意。旋於二十九日，^臣奕訢接見俄首，言詞雖屬狡黠，而情形頗為馴順，惟求早定條約，別無要挾各情。⁷¹

奕訢並道破俄人鯨吞蠶食中國領土的圖謀：

^臣奕訢偕瑞常等赴俄羅斯南館，該夷呈出偽詔，並換約禮節各一件。其換約禮節，雖意在鄭重其事，而實則為日後謬據，與暎夷換約時所書執據鬻運略同。^臣等恐該夷得步進步，故智復萌，再有要求，即將所定條約畫押蓋印，以杜枝節。……^臣處處以思，不使該夷得以施其技倆……。⁷²

在另一道奏摺裡，他更直言俄人言詞難信且與英人狼狽為奸：

^臣等伏思各夷犬羊性成，以暎夷為最狂悖，而俄夷最為詭譎，始則狼狽為奸。此時助順勦賊，又稱不可令暎嘑知之，言詞閃爍，殊難憑信……。⁷³

中國在1858年至1860年間喪失的72萬9,000平方公里土地，對中國顏面與聲望的打擊難以估算，其間的痛苦遠非外人所能理解，縱然一世紀後仍揮之不去。中國此後亦不再視俄人為亞洲內陸的野蠻人，而是挾帶歐洲優越科技與傳統野蠻威脅的敵人，今日的北方邊界更是羞辱的象徵。但俄人多年後才警覺中國的憤懣，此前還陶醉於自己宣傳的俄中友誼，相信自己對中國是獨特、友善的。⁷⁴

中國的龐大人口對蘇聯若是無形的人口擴張黃禍，領土爭議則為

⁷¹ 賈楨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5550。原文所載之「暎」、「嘑」即為當時的英法兩國，在英與佛兩字旁加上口有貶抑之意，以突顯中國為天朝。

⁷² 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頁5573-5574。

⁷³ 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頁5615。

⁷⁴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94.

此提供有形基礎，兩者此後更交織地帶給俄人更大的夢魘。

4. 戰爭的不可避免

蘇中共在1970年代的全面對抗開始摻入軍事因素，受珍寶島事件刺激，蘇聯遠東駐軍短短四年內即增加三倍，中國自1973年起也快速增兵邊防。1970年代末，兩國邊界的軍力對峙已可和中歐地區態勢相睥睨。⁷⁵

極具份量且曾參與許多重要決策和談判的蘇共中央智囊阿爾巴托夫（Georgy Arbatov, 1923-2010），曾憶及當時的氛圍：

我們活在軍事衝突的恐懼與危險裡。就我所知，我敢說我們從未計劃攻擊中國，我也確定中國並未計劃攻擊我們。

我們面臨的不同情勢混合：現實政治的威脅與對中國下一步爲何的畏懼和一無所知，使得政治人物與公眾們心懸於我們的外交危機。⁷⁶

阿爾巴托夫一語道破1960至1970年代蘇聯因爲不了解中國而衍生的畏懼，官方後續的推波助瀾與對中國的臆測及不實批判亦由此而來。

盧金即指出，當時與蘇共中央委員會關係密切而專職鬥爭中共的科學院遠東所，其批判多半是扭曲的，且常將西方對蘇聯的批判套用於中共。對中國軍事威脅的畏懼，與中國可能隨時入侵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和遠東此類觀點，不僅出現於官方宣傳，亦見於查禁刊物。如阿馬爾里克（Andrei Amal'rik, 1938-1980）即認爲蘇聯崩潰的主因，在於與中國一戰勢不可免。堅定不移的革命邏輯迫使中國走上戰爭，除爲過往屈辱復仇外，更企圖獲取新領土以解決人口過剩、饑荒和農

⁷⁵ 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1979-1989）》（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頁27-28。

⁷⁶ G. A. Arbatov,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2), 94-95.

業等問題，而中國在蘇聯看見了以前曾為中國勢力範圍的西伯利亞和遠東。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2008）則認為必然一戰的原因有二：一為中國百萬人口加諸於西伯利亞未開發土地的壓力，二為意識形態分歧。梅德韋傑夫（Roy Medvedev，1925-）則認為不應過於高估中國的戰爭威脅，蘇聯仍有軍事優勢，中國不至於自取滅亡；再者，中國仍有未開墾的領土，未必會為了西伯利亞，甚至於意識形態而開戰。⁷⁷

此時的中國威脅與戰爭不可避免之說，與蘇聯官方的鼓吹相當有關。再者，無論輿情支持官方論點與否，對中國威脅的臆測同樣出於對中國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Chauvinism）的顧忌，而且背後動因仍與過往導致黃禍恐懼的人口擴張和疆界爭議有關。

對蘇聯而言，非社會主義國家——日本雖是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雙重敵人，卻已無關黃禍；中國則從無產階級兄弟反目為修正主義敵人，而且兩國間各種衝突的本質，仍與昔日的黃禍恐懼藕斷絲連。透過與歷史脈絡的連結，我們了解到蘇聯雖然因為意識形態而對黃禍有所忌諱並隱瞞不提，但過往的黃禍恐懼仍趁隙而動，未因刻意隱諱而消弭。

（三）當代的具體化

1. 黃禍仍存？

（1）日本仍是黃禍？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也反思過往，首任外長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1951-）即表示：

我們過去深受彌賽亞式意識形態束縛，因而犧牲國家利益。共產主義使我們意圖向外擴張，而且不計衝突後果。將我們的意

⁷⁷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125, 135-136, 139-140.

識形態強加於他國的作法，則使我們的經濟衰竭。⁷⁸

這意味俄羅斯今後將務實正視國家利益，並視周遭為置人類利益至上的開放合作文明國際社群，而俄羅斯的目標即為完全融入該社群，成為民主與愛好和平的國家。⁷⁹ 俄國對宿敵——中國與日本的想法自也有所不同。在1993年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的討論裡，我們從大西洋學派(Atlanticism)代表人物——科濟列夫的看法，便能了解彼時俄國外交的優先次序為何：

俄羅斯若欲成為一等一的超強，當前必須與近鄰(near aboard)國家交好。除了近鄰，中國是最靠近我們的鄰國。我國現行的中國政策和對朝鮮及對日政策同樣重要，這些國家是我們絕不能忘的。但當前的國家利益並不在亞洲，而在西方國家中為首的美國。為此，俄國應與美國建立戰略層次同盟的夥伴關係……。⁸⁰

顯見俄國的中國政策當時一度降至與日本、南北韓同等位階，與昔日美俄中戰略三角時期大相逕庭。⁸¹ 俄羅斯雖也未側重東方，但也非毫無作為。在日本「政經不分離」的原則下，俄日仍確立彼此關係的新架構，但卻因延宕未決的北方四島問題，迄今未有更大進展。

北方四島問題是否具有黃禍意涵？俄方顧忌的其實仍是美國主導的美日安保，而軍方又尤其強硬，原因在於北方四島的戰略價值非

⁷⁸ “A Transformed Russia in a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April-May (1992), 85.

⁷⁹ А. Козырев, (科濟列夫) “Преображ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 Новом Мире,” (在新世界裡已轉型的俄羅斯) *Известия*, (消息報) 2 января, 1992, 3.

⁸⁰ “Дискуссия о том, какой быть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關於俄羅斯對外政策走向的討論)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生活) (февраль 1993), 6-7.

⁸¹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2期（2009年6月），頁124。

比尋常。部署於此的監視系統能使偵察範圍向外沿伸800至1,000公里，故可有效攔截敵方戰機與船艦。失去北方四島，將使俄國喪失對周邊海峽通道的控制，薩哈林州（Sakhalin Oblast'）門戶將會大開，太平洋艦隊更將被迫一分為二。北方四島一旦為日本掌握，在美日安保架構下將被對方作為海軍基地前哨。⁸²

是故，只要美日安保同盟存在，美國因素仍將左右俄日關係；反之，日本才需自保，而被俄國視為內海的鄂霍茨克海（Sea of Okhotsk）則更需北方四島屏障，否則俄國遠東門戶仍將大開，屆時日本才可能成為黃禍。

因此，日本對俄國既無移民或兼併領土意圖，又提供大量的援助，⁸³無論從那個方面都難與黃禍聯想。

(2) 中國真是戰略夥伴？

科濟列夫曾樂觀表示：

透過與外在世界合作而非衝突，從而實現俄羅斯的利益，使我們在許多面向發現自己是亞洲國家。這樣的改變與我們偉大的東方鄰居中國有關。在歷經意識形態、滯礙的友誼與無法解釋、完全敵對的痛苦挫折後，俄羅斯和中國這塊文明「大陸」已堅定邁向良好鄰誼與合作之途。在策劃俄國外交政策時，我們是將自己定位於與中國良好和睦的戰略角色。⁸⁴

⁸² Г. Мехов, (蔑何夫) “Военный аспект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ы’,” (「領土問題」的戰略觀點)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紅星報) 22 июля, 1992, 3.

⁸³ Lowell Dittmer,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Relationship: Ghost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Yufan Hao and C. X. George Wei eds., *Challenges t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iplomacy,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xt World Pow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9), 105-106. 日本今日已是俄國第三大援助捐贈者，僅次於美國與德國；日俄貿易不僅於1992年至1995年間增加40%，兩國2007年的貿易額更超過200億美元。

⁸⁴ А. Козырев, (科濟列夫) “‘Азиатским’ путём - к систем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Азии,” (以「亞洲」途徑 - 通往亞洲安全體系) *Сегодня*, (今日報) 4 февраля, 1994, 3.

俄中關係後續也扶搖直上發展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友好階段。但有別於俄中稱頌彼此的友好，羅德明（Lowell Dittmer，1941-）卻道破其間的弔詭。

他指出俄美組合才是世上首組戰略夥伴關係，諷刺的是俄中從未能就意識形態取得共識，但在中國於天安門事件後被制裁，而俄國經改失敗未獲西方及時援助後，雙方卻在窘境下匯合。彼此雖未允諾或要求特殊保證，也能同時擁有許多戰略夥伴，但仍是各自夥伴組合裡的樞紐。對中國而言，此為大國戰略基本門檻，也僅此能左右唯一的超強——美國。俄中戰略夥伴關係雖不針對像美國這樣的第三國，但兩國得自美國的經濟獲益卻甚於彼此。美國向來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但中國卻非俄國最重要者。在經濟利害有限，又缺乏彼此認定的目標或對手的情況下，此一夥伴關係的意義究竟為何？俄中合作有時相當有效，但更多時候卻多半不足，原因或許在於其僅止於宣示而未付諸實踐。⁸⁵

盧金就俄中匯合國內動因的解讀，可讓我們更了解其間虛實。他以為俄國由西傾轉而關切中國，主要受以下的影響：

首先是視中國為主要商業夥伴的軍工複合體。俄羅斯獨立後軍事預算削減，失去內需的軍工產業僅能靠出口獲利，而中國又是最積極的買家。政府高層也理解軍售能解決預算短缺與化解某些社會問題，故接受軍工複合體與中國更緊密的呼籲。

再者為國會下院——國家杜馬（State Duma），其影響力在1995年大選後尤然，因彼時共黨勢力龐大，而外交委員會也同樣親中，雖

⁸⁵ Dittmer,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Relationship: Ghost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92, 94, 103. 如1999年俄中反對聯合國介入（United Nations, UN）科索沃（Kosovo），迫使美國轉而訴諸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執行；又如俄中反對美國對北韓升高制裁壓力，抑或任何制裁與先發制人攻擊。但俄中反對美國飛彈防禦計畫及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卻是失敗，在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也同樣徒勞。

無法直接影響外交，卻能透過多重管道間接運作。學術社群亦不容小覷，其雖常被理解為營造輿論氛圍而間接影響政策，但當選議員或被任命要職而參與決策者亦有；獻策分析亦是一途，如科學院遠東所核心很可能即為共黨提供諮詢。

擔憂中國威脅而鼓吹反華者亦有，尤其是濱海邊疆區（Primorskii krai）與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Khabarovskii krai）雖未完全反對，卻嚴格控管邊境貿易，並設法影響中央決策，俄中免簽機制即因而廢除。它們雖未能破壞邊界協議，卻仍設法吸引全國關注；此外，前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 1931-2007）任內地方權力高漲，亦使其能片面改變邊界機制。

最後則是莫斯科一些無意間鼓吹黃禍論的政治人物，即有官員曾提及遠東區的豐富資源一旦開放後，中國人和朝鮮人便會逐步占領當地，並宣示其眯眯眼共和國的主權。在遠東區領導人影響力最強的國會上院——聯邦委員會（Federation Council），黃禍論尤其受歡迎。前國防部長拉吉歐諾夫（Igor' Rodionov, 1931-）亦曾將中國列為俄國主要潛在敵人之一。2000年6月，國家杜馬聯邦事務暨區域政策委員會更宣傳阿穆爾州（Amurskaya oblast'）與遠東區有潛在的中國擴張威脅。

學術社群與政府部門雖不乏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卻尚不至於成為官方主流；國會反華勢力則被覬覦中國市場之軍重工業所支持的區域領導人們抵銷，但這已使得總統與外交部門不得不更關注亞太地區和中國。⁸⁶

2. 當代黃禍為何？

正反力量的作用使得俄國雙頭鷹不再只關注西方，而是轉而同時面向東西方。與此同時，「中國威脅論」在俄中國力此消彼長下又被炒熱亦極具爭議。

⁸⁶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301-305.

在全球能源爭奪的白熱化下，資源豐富的俄屬遠東和西伯利亞自然倍受關注。前總統外交顧問卡拉噶諾夫（Sergei Karaganov，1952-）即指出，俄國的挑戰在於可能淪為未來強權——中國的原物料供應者與政治衛星國，而非來自古老游牧部落或數以百萬計的中國移民客工對西伯利亞與遠東的兼併。由於失序和貪瀆，俄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將以每年4%至5%的速度落後於中國。⁸⁷可見卡拉噶諾夫所關切的並非外來人口壓力，而是國內體制怠惰，但此又不同於西化派恐懼內部中國化所導致精神信仰腐蝕的型態。

位於海參崴的科學院遠東分院遠東民族所所長拉林（Viktor Larin，1952-）也擔憂外國對俄國資源的覬覦，他認為國外對西伯利亞與遠東區已有共識：這片地區不僅是俄國財產，也是世界的財產。東部開發成功可確保俄國的勃興與世界地位的鞏固，反之則可能引發列強於當地經濟殖民的臆想。⁸⁸

是故，急需能源的中國自然不會置身事外，其雖渴望引進資源以振興東北工業基地和因應國內需求，但俄國本身亦亟需外資協助難度甚高的東部油氣開發，以及再啟動因國際金融危機而被迫延宕的項目，並藉由對亞太出口能源而提昇影響力。俄中能源合作的空間顯然甚為廣闊，俄國更於2008年底與中國達成供油換取貸款協議。儘管俄人擔憂遠東區淪為原料附庸，卻未有與黃禍掛鈎之說。

因此，拉林雖憂慮外國對俄國資源的覬覦，卻認為遠東區人口銳減與外流才是威脅源頭，並說明當地人口銳減已是國家安全威脅的根本，外來移民的增加甚至可能使俄國失去其遠東區。⁸⁹馮紹雷亦指

⁸⁷ С. Караганов, (卡拉噶諾夫) “Вперед в Азию?” (前進亞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俄羅斯報) 22 июля, 2008, 1.

⁸⁸ В. Л. 拉林著，李沖譯：〈俄中美三角中的俄羅斯東部地區〉，《俄羅斯研究》2008年第4期，頁34。

⁸⁹ 拉林：〈俄中美三角中的俄羅斯東部地區〉，頁35；В. Ларин (拉林) и Л. Ларина, (拉林娜)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俄羅斯於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安全與合作的

出，遠東地區移民和勞務合作問題對俄羅斯而言已是最為敏感，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⁹⁰

兩國學者將矛頭指向中國移民並非無的放矢，正因俄羅斯獨立後對中國的開放，才使得俄人的古老恐懼復萌。傳媒對黃禍議題的關切與政治人物的煽動，1990年代俄國在東方猶如近百年前斯托里賓所面對的情景。隨著中國人總能排除萬難地越界貿易，相關移民法令亦益發嚴格，終於造成近年中國移民客工的被迫大規模離境，期間曾用以形容中國威脅的「黃禍」一詞也因而再現。

中國移民問題究竟有何特別之處，能讓昔日的「黃禍」借屍還魂？回顧中俄關係史即能得知，從帝俄至蘇聯數百年間多是俄強中弱的局面，直至蘇聯解體後權力對比才驟然逆轉。但自帝俄十九世紀中葉積極經略遠東後，俄人擔憂中國人滿為患而充斥整個西伯利亞，乃至於越過烏拉山直抵伏爾加河畔的恐懼，卻如影隨形地存在，未因世局變遷而消弭。⁹¹此一恐懼發展到極致便有所謂的「黃禍」指稱，而時間點更是在清末中國最孱弱之際。在清末中國幾近被列強瓜分與俄國強於中國下，俄人尚且擔憂中國人湧入，更遑論兩國國力對比已然反轉的今日。

中國移民問題固然勾起俄人的黃禍記憶，但中國在其他領域對俄羅斯的威脅是否有與黃禍聯結的可能？回溯1990年代，中國經濟力量遠勝於俄羅斯，兼以非法移民潮擁入，使得俄人開始擔憂中國人和平占領其遠東區；二十一世紀初，俄國經濟拜世界能源價格上漲而復甦，但俄人仍視中國移民為威脅。作為中國人口擴張的外在經濟表徵——邊境貿易，雖是俄人日常生活極為重要的支柱，但在兩國貿易所

民意反映（根據2010年遠東居民訪談的結果））*Россия и АТР*，（俄羅斯與亞太地區）No.1（2011），55。

⁹⁰ 馮紹雷：〈遠東地區：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的安全認知〉，《俄羅斯研究》2007年第5期，頁60。

⁹¹ 劉蕭翔：〈論俄羅斯的「恐中症」——以新移民法針對性為例〉，《俄羅斯學報》第10期（2012年1月），頁81-82。

占的份額卻是九牛一毛，遠不及軍售和能源項目。若說中國欲購回過往割讓的領土，在1990年代俄國經濟跌至谷底時即未曾聽聞，更遑論今日。因此，中國尚不至於有在經濟上廣泛全面地威脅俄羅斯，乃至於造成俄人黃禍恐慌的可能。

至於中國是否可能構成過往日本那般的軍事黃禍？目前，中國以軍事實力威逼俄國，抑或強取過往割讓領土的可能性又趨近於零。俄中國力對比今日雖驟然反轉，但俄國軍事實力仍勝中國一籌，更遑論中國在軍事科技與武器系統對俄國的長年依賴。是故，中國現階段在經濟或軍事上威脅俄羅斯的可能皆微乎其微。

俄人黃禍陰霾何以揮之不去，或許能從中國處理南海主權問題的態度，以及對日本釣魚臺國有化的強硬反制獲得啟示。中國對於歷史上曾屬於己的領土未必輕言放棄，僅是待時而動，此亦為何俄國內部一直有中國藉由移民寧靜索回領土的恐懼。

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1952-）於2012年總統大選前的宣示裡，即點出今日俄中兩國已解決所有的重大政治問題，包括最重要的邊界問題；兩國間雖仍有小磨擦，但未來的發展仍相當有前景。然而，俄羅斯仍將密切地關注來自中國的移民潮。可見黃禍論並非子虛烏有，僅是伺時而動。⁹² 黃禍一詞在俄國歷史裡雖非單指中國，日本崛起後亦涵蓋在內，但日本軍事黃禍今日已遠，中國人口黃禍迄今卻仍在。

三、俄羅斯黃禍觀念的本質

隨著帝俄積極經略遠東，以及俄國與中日兩國在東亞衝突的不斷升高，集體歷史記憶黃禍因而重現於俄國。對黃禍的恐懼普遍存在於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間，但在俄國卻又尤甚，而且影響俄國百年來的

⁹² 劉蕭翔：〈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身分、利益的解構與建構〉，《問題與研究》第52卷第2期（2013年6月），頁133-134。

遠東政策甚深。我們也發現俄羅斯的黃禍觀念百餘年來與時俱進地演變，且隨著世局變遷與內部政權嬗遞而有不同的詮釋。

在帝俄時期，黃禍觀念尚處於醞釀階段，且隨著國家定位與未來走向的流派之爭而紛雜多樣。在西化派與衍生的分支裡，隨著對世局感受的不同，將黃禍作為悲觀消極預言或合理化自身使命者皆有，中國與日本則依序扮演黃禍的角色。斯拉夫派則在內外激盪下蛻變為俄國獨特的彌賽亞主義，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方亞洲，則隨著訴求不同，時而是黃禍，時而是盟友。黃禍對斯拉夫派既是威脅，亦為實踐其天命的合理憑藉。但西化派與斯拉夫派在帝俄最後十餘年裡，皆因日本崛起而視日本為主要黃禍，中國則因為人口優勢有被動員的可能，而被視為次要者。及至帝俄末年，俄國對黃禍的議論又更為務實，從思想家的推論轉而在實務裡獲得初步印證。俄日戰爭後，隨著俄日關係改善，日本軍事黃禍暫時化解，但中國移民黃禍卻仍續存。因此，中國移民問題絕大多數時候雖多無黃禍之名卻有黃禍之實，僅未如日本軍事黃禍那般短暫且引人側目。再者，由於俄國以西方思維主觀詮釋東方文明，故此一階段的東西文明交流，非但無助於相互理解，反倒強化既有的文明對立，並喚起沉寂的黃禍記憶。

蘇聯時期因囿於意識形態，黃禍一詞反倒成為隱諱，但並不代表就此消失。梳理該階段與帝俄時期的歷史脈絡連結，即能發現導致黃禍的因素依舊存在，並無差異。對蘇聯而言，他人若非無產階級友人，即為資產階級敵人，故宿敵日本雖是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雙重敵人，卻與帶有種族歧見的黃禍意識無關。反觀中國卻從無產階級兄弟反目為修正主義敵人，而且兩國間的各種衝突本質仍與昔日的黃禍恐懼藕斷絲連。是故，蘇聯雖因為意識形態而對黃禍有所忌諱，但過往的黃禍恐懼仍趁隙而動，未因刻意隱諱而消弭。

俄羅斯獨立後，日本似乎仍是威脅，但俄國真正忌憚的實為日本背後的美國因素；俄中關係雖然扶搖直上，但移民問題卻又成為兩國間的悖論。俄國國內就中國移民黃禍再現之說也甚囂塵上，當代俄羅

斯的黃禍觀念因而具體化爲中國移民問題。

經由自古至今的梳理，我們了解到俄羅斯的黃禍觀念雖然與時俱進，但仍有其變與不變。變者即是外在世局轉變造成的影響，如帝俄末年西化派與斯拉夫派在日本崛起後，即不約而同地視日本爲黃禍；同樣地，日本在蘇聯時期與當代亦因意識形態與美國因素而又從黃禍之列除名。不變者則是導致黃禍恐懼的本質。如前所述，俄國自十九世紀中葉經略遠東後，擔憂中國人湧入的恐懼即如影隨形地存在，未因世局變遷而消弭；其間雖因日本崛起而讓位，但在俄日關係和緩後仍舊突兀。黃禍在蘇聯時期雖成忌諱，但在導致蘇中共反目的各種衝突裡，無形人口擴張仍是不變的要素，俄中糾葛的疆界爭議又爲此提供有形基礎。蘇聯解體後，俄中國力對比數百年來的首度反轉，更強化俄國擔憂中國人湧入的恐懼，並具體化爲當代的黃禍觀念。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導致俄人黃禍恐懼的中國人口擴張壓力儘管無形，但仍僅是種表徵，而其背後底蘊究竟爲何？

作爲多民族國家的俄羅斯，並不乏對待其他民族的經驗，但百餘年來面對中國人卻又如臨大敵，雖未及文明衝突，但文明隔閡確實存在。如身處東西文明交會前沿的遠東區俄人，其與東亞文化互動多年後，不僅仍維持自身的歐洲特質，亦無意融入周邊的東亞世界，對鄰居們的認知亦無顯著轉變。故就某種程度而言，俄人仍然持續以過往的西方主觀認知詮釋東方。另一方面，中國移民客工深入俄國各地謀生多年，也鮮有融入異國文化的念頭，寧可群聚相互照應。如此一來，不同文化非但未能充分對話，文明的隔閡與對立反倒加深，這樣的情景實又與百餘年前黃禍重現俄國的場景無異。

因此，中國人口擴張雖是俄羅斯黃禍觀念百餘年來迄今的不變因子，但潛藏於後所反映的實爲東西文明的對立。科技日新月異使國家安全威脅的定義推陳出新，俄羅斯黃禍觀念的外在表徵未來或許還可能有不同的樣貌呈現，其認知也可能因爲世局驟變而短暫轉變，但在文化歧異未能消弭或有效對話前，東西文明對立仍將是俄羅斯黃禍觀念裡不變的核心本質。

徵引書目

- B. JI. 拉林著，李沖譯：〈俄中美三角中的俄羅斯東部地區〉，《俄羅斯研究》，2008年第4期，頁34-38。
- 王兆徽：〈恰達耶夫「哲學書簡」在俄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俄羅斯學報》（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創刊號（2001年1月），頁1-10。
- 尼基塔·謝·赫魯曉夫著，述弢、王尊賢、袁堅、范國恩、郭家申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版。
- 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豐林譯，徐昌翰審校：《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呂浦、張振鷗：《「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
- 明驥：《中俄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上冊。
- 海因茨·哥爾維策爾：《黃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
- 張宗海：〈謬種流傳的「黃禍」論——中國人難以在俄羅斯立足的歷史根源〉，收於關貴河、欒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93-114。
- 馮紹雷：〈遠東地區：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的安全認知〉，《俄羅斯研究》，2007年第5期，頁54-61。
- 賈楨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2期（2009年6月），頁107-144。
- 劉蕭翔：〈論俄羅斯的「恐中症」——以新移民法針對性為例〉，《俄羅斯學報》，第10期（2012年1月），頁65-87。

- 劉蕭翔：〈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身分、利益的解構與建構〉，《問題與研究》，第52卷第2期，（2013年6月），頁99-143。
- 羅福惠：《黃禍論》，新店：立緒文化，2007年。
- 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1979-1989）》，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
- “A Transformed Russia in a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April-May (1992), 81-113.
- Arbatov, G. A.,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2.
- Dittmer, Lowell,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Relationship: Ghost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Yufan Hao and C. X. George Wei eds., *Challenges t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iplomacy,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xt World Pow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9, 87-113.
- Herzen, A.,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revised by Humphrey Higgins, *My Past and Thoughts: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Vol. 3*.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68.
- Herzen, A.,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revised by Humphrey Higgins, *My Past and Thoughts: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Vol. 4*.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68.
- Khrushchev, N. 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 Khrushchev, N. 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 Kotkin, Stephen, and David Wolff, “After Communism: Resources for Cooperation or Confrontation,”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95, 187-191.

-
- Larin, Viktor, “‘Yellow Peril’ Agai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95, 290-301.
- Levine, Isaac Don,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0.
- Lukin, Alexander,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3.
- Mackenzie, David, and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 Co., 1993.
- Marks, Steven G., “Conquering the Great East: Kulomzin, Peasant Resettle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iberia,”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95, 23-39.
- Ni, Xiaoquan,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 and Policies towar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Judith Thornton and Charles E. Ziegler eds.,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WA: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375-395.
- Paine, Sarah C. M.,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 Soloviev, V.,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Bakshy, *War, Progress,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cluding A Short Story of Anti-Christ. Three Conversation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15.
- Stephan, John,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 Kaiser's Memoirs, Wilhelm II, Emperor of Germany, 1888-1918,
English translated by Thomas R. Ybarra.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22.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Being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Military Policy and Power of Russia and on the
Campaign in the Far East*. By General Kuropatkin Vol. 2,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and edited by E. D. Swinton, D.S.O., R.E.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09.

“Дискуссия о том, какой быть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февраль 1993), 6-22.

Караганов, С., “Вперед в Аз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2 июля, 2008, с. 1.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часть III*.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

Козырев, А., “Преображ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 Новом Мире,” *Известия*, 2
января, 1992, 3.

Козырев, А., “‘Азиатским’ путём- к систем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Азии,”
Сегодня, 4 февраля, 1994, 3

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П., “Китайцы жертвы сталин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2 (1991), 142-145.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етербург: Спб.,
тип. т-ва А. С. Суворина. 1913.

Ларин, В., и Л. Лар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No.1 (2011), 49-69.

Мехов, Г., “Военный аспект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22 июля, 1992, 3.

Радлов, Э. Л. под ред., *Письма Владимира Сергеевича Соловьёва, Том III*. С.-Петербург: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1911.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Ю. Г. под ред.,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1906-1911*.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1.